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田雪原

田雪原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TIANXUEYUAN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田雪原

田雪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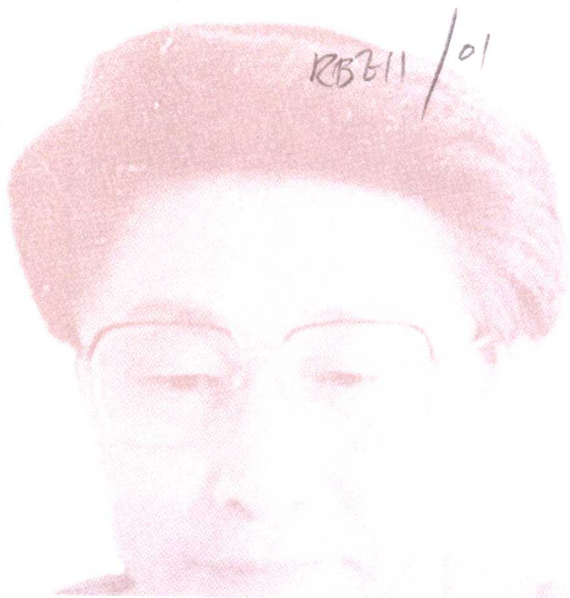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TIANXUEYUAN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雪原文集/田雪原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803-X

I. 田... II. 田... III. 人口学—文集 IV. C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8653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田雪原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75 插页 8 字数 453 600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6-1803-X/D·34

定价: 6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人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梁景



小传

田雪原,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64年8月—1979年4月在国家教育部等国家机关工作,1979年4月—1982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人口经济研究,1982年5月—1983年6月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作高级访问学者,1984年4月—1998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心)所长(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成员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新时期人口论》、《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学》等专著23部(含主编),《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论文500余篇(含30多篇英、俄、日文),研究报告30余篇,本人独自撰写在500万字以上,论文代表作收集在《田雪原文集》一、二、三、四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6项,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美国、日本合作项目5项,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综合发展、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表了有独到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和美、日、荷、比、澳等国作学术报告多次,受到普遍好评和重视。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1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颁发证书并在《成功的人》中作了业绩介绍,1995年美国传记协会(ABI)载入“世界五千名人录”颁发证书并作了事迹介绍,1996年获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获国家图书奖,2003年获第六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科研成果中,还有十多项获部委级特别荣誉奖、一等奖。

自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为学术委员出版一部《文集》，借此机会清理一下多年走过的研究路子，从中得到不少教益。“温故而知新”。通过对自己发表过的论著的重新审视，找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学术位置，总结做得好和做得不够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激励自己更好地站到学科前沿，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

1982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一位到中国作交换学者的博士，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信给我说：“看了你的《新时期人口论》50多页，心中有一股激情在动，我好感动”；无独有偶，国内一好友也对我说：“田老师的文章隐含着有一股激情。”我想，不管我的文章别人作何评价，但有一点她们言中了：我的文章中确实含着我的感情，一种期盼国家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深情。之所以称之为深情，是因为这种感情在我的血液中经过五六十年的流淌和升华，已经深深地扎根、生长、开花、结果，有一天，这种深情连同我的躯壳一起会成为活化石。正是这种深情，驱使我在学坛上不断耕耘，从不敢有半点儿懈怠；正是这种深情，使我从经济学“服从分配”转到人口学领域，做了近30年的人口科学研究。说来话长，要说清我的学术观点是怎样融化在这种深情之中的，大概也是部分中国学者的一种学术情结吧，还得从头说起。

当我来到人间作为被称为“煤铁之城”故乡一员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鬼子的大刀，刀光剑影伴随着“八咯呀路”的吼声，在中

国劳工面前回荡。当时不知道还有一个偌大的中国存在，只知道上海关外的东北伪满洲国。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不一样？干的活不一样，日本人拿着战刀指挥，中国人干最脏最累的苦力；吃的饭不一样，日本人吃的是大米白面，中国人吃的是橡子面窝窝头；地位不一样，日本人说一不二，中国人却只能听吆喝。后来“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结束了中国人做牛做马的日子；可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亡国奴的呢？这是我幼小心灵中解不开的谜。上小学时，做教师的哥哥送给我一本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我把它称之为打开我心灵天窗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当读到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祖国母亲的身体、吸吮母亲的乳汁时，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心头充满悲愤，作为祖国母亲的儿子，立下平生要为国家富强献身之志。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抱着这样的志向走进北京大学殿堂，心中好不欢畅；然而入学后不久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却使我陷入迷茫。于是便躲在图书馆第五阅览室一隅，找来马老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一大堆批判文章读了起来。越读越觉得马老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很有道理，更为那种年近八十誓死捍卫真理、直至战死为止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所打动；相反，那些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却讲不出多少道理，除了标签式的政治口号和扣大帽子之外，便是偷换前提一类的逻辑推演，其目的就是要将《新人口论》批臭，把马寅初一巴掌打下去。特别是康生亲临北大点名“属于哪个马家”之后，包括马老居住的燕南园在内的整个燕园，更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最后马老真的从北大校园、政坛和学坛上“蒸发”了。这使我着实困惑了一段时间，并且隐约地感到，有一天颠倒的历史还会重新颠倒过来的。当时不清楚，正是这种情结和不同认识，埋下后来我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和走上人口科学研究的种子。

1964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先是参加两年“四清”,接着便是所谓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和这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经历外,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人说来,原来盼望祖国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情结受到莫大的伤害。在“四清”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新中国成立十五六年后,许多农民依然过着缺吃少穿的清贫日子的情景;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直至70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几两油、肉、蛋,自行车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凭票供应,在饥饿、温饱、小康、富裕和最富裕几个发展阶段中,处在由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由此不能不对当时的人民公社以及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产生疑问: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程,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短缺困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期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便即刻投身到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中去。收入本《文集》的“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恢复名誉”等几篇经济论文,就是那时憋了多年的理论上的呐喊。不过积压多年的最大学术情结,还是1959年入学后那场对马寅初的批判;于是我把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写出收入本《文集》第一篇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等几篇文章。并将马老其他几篇有关人口的文章汇集到一起,以《新人口论》命名重新出版,三年内连续出了3版。自此,同人口科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人口经济研究。后又将挂靠在社会学所的人口研究中心(筹备组)合并过来,组成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不过我十分清楚,虽然经济学同人口学联系紧密,但是“隔行如隔山”,必须补上人口学这一课。机会来了,1982年春美国东西方中心邀请我到那里作高级访问学者,我利用这一年

多的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当今主要的人口学论著,并且结识了前往那里访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 A. 柯尔、芝加哥大学的 G. S. 贝克尔和 F. 豪泽、布朗大学的 S. 哥德斯坦、伦敦大学的布拉斯、日本大学的黑田俊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德维尔等名家交流,学习他们之所长,算是补上人口学这一课。二三十年来,以人口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路子,是这样走过来的:

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期,重点是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收入本《文集》的,主要是第一部分“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前 2 篇,第二部分“人口与经济”中的前 3 篇,第五部分“人口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中的第 1 篇等。中心是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平反,破除“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过剩性质,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政策建议。

第二阶段重点为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1980 年 3—5 月中央召开人口座谈会,60 多位相关部委领导和少数学者出席,大家共商国家人口大计,前后共开了 5 次。从中南海开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形成文件又回到中南海,着实令人鼓舞。我除了用研究成果力陈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及其政策选择外,受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还担负会议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虽然许多天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但对会议提出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不会导致新生儿智商下降、劳动力供给短缺、老龄化不堪重负、家庭发展四二一年龄结构、人口城乡和地区分布结构发生逆转等问题饶有兴味,并且接受领导交代的以个人名义对这些问题写出附件,附在主报告后面以备领导查询时,仍是欣然应诺。现在看来,对这些问题的阐释,至少是实事求是和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只是这些阐释许多尚不能收入《文集》发表。1983 年 6 月我从美国归来后不久,主

持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所)的工作,承担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2000年的中国”国家项目研究,主持首篇研究报告“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讨论并定下我国人口发展的方针大计,我完全赞同;但要在2000年将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除非实行更严格的生育政策,否则不大可能。本着“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原则,我在这份内部报告中提出和论证了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0亿、12.5亿、12.8亿的低、中、高三种方案,并且倾向于控制在12.5亿左右的中位预测方案。为此曾招来某些非议和指责,包括来自有的领导同志和学术界“权威”人士的指责;这时我想起了马寅初,于是坚持12.5亿不动摇,最后还是实践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收入本《文集》第一部分的“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等7篇,代表了前期我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观点。这几篇文章,提出并论证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生育政策决策选择。

后期为步入21世纪以后,针对新的人口态势特别是“五大人口高峰”的行将来临,由我主持的课题组提出“三步走”总体人口发展战略思路:第一步是将高生育率降下来,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第二步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人口的零增长,这一步也已经走过10年的路程,还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第三步是人口零增长以后,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资源、环境状况,确定理想适度人口目标,这是更长远的事情。当前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应锁定在人口的零增长以及同零增长相适应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的合理选择上。从既要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又要兼顾到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实际出发,提出并论证了“软着陆”战略。所谓“软着陆”,是对照“硬着陆”和“缓着陆”比较而言的:“硬着陆”表现为生育率的继续持续下降,较少顾及到下降后对人口质

量特别是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缓着陆”则过多考虑到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质量方面的影响，在“着陆”的时间上向后推迟，空间上人口数量还有较大的增加。不管是哪种“着陆”，都以人口零增长作为“着陆”点是明确的。立足于中位预测的“软着陆”方案，较好地吸纳了低方案“硬着陆”人口数量控制有效，高方案“缓着陆”人口结构比较合理的优点；同时也避免了低方案“硬着陆”年龄结构变动过于急速，高方案“缓着陆”人口数量控制效果较差的缺点，因而是符合当前我国人口态势、扬长避短的比较理想的方案。可表述为：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合理变动，积极稳妥地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发展战略。据此，提出生育率变动方案的决策选择。

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重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老龄化以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收入本《文集》的，主要为第四部分“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11 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大的担心，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因为生育率下降越迅速，数量控制越有成效，年龄结构老龄化便越严重，人口数量控制必须限定在老龄化允许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我主持的“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与老年社会保障改革研究”，也是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继续。该项研究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公安部、民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委的指导和支持，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城乡抽样调查队合作，进行了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调查。抽样调查标准时间定为 1987 年 7 月 1 日零时，入户调查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36 755 人，其中城镇 17 819 人，共抽调除西藏、台湾之外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特大、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和镇；乡村为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830 个县，

共 18 936 人,对全国和省级有足够代表性,为我国首次最大规模的全国老年人口抽样调查。取得第一手完整、系统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 1987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配资料》;召开了国内、国际科学讨论会,出版了中、英文论文集。笔者在对该调查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基础上,发表《中国 1987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报告》,并撰写“中国老年人口宏观”等多篇学术论文,主编《中国老年人口》(人口、经济、社会三卷),《报告》等 6 篇论文,收入本《文集》。这几篇文章,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现状、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劳动自养,实行社养、家养、自养“三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安全度过老龄化严重阶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成果。为了比较各省、区、市老年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提出并具体计算了其意义为平均所受教育年限的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指数。即依据调查数据资料,设定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数;再依据实际上各层次受教育人数作加权处理,得出总体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限。此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优点,在于可将不同总体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加以比较,而不是大、中、小学、文盲等的单项受教育水平的比较。同时基于调查数据对将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做出预测,分析不同方案下老龄化的特点和问题,提供相应的决策选择建议。

与人口老龄化研究同步进行的,是人口城市化研究。因为无论人口发展战略还是老龄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城乡结构,离不开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收入本《文集》中的 5 篇文章,一是总结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着意说明改革开放给人口城市化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是阐明中国城镇人口划分标准的历史沿革,不同划分标准的影响;三是对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20 年,将是人口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期。

这对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结构的调整,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四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侧重微观的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并涉及中观社区研究。要落实人口发展战略,除了宏观上要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目标和做好发展规划,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等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外,还必须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展开研究,提出相应策略和解决的措施。为此,承担“八五”国家重点和联合国资助项目“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这是一项实证研究性质很强的课题,同样要进行一定数量的社会调查。抽样调查总体,选取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海南 5 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区和台湾省以外,以 25 个省、区、市为调查总体;然后依据人均国民收入、农业人均纯收入、生育率等 7 项指标分为 5 类,抽取 10 个省和直辖市,每个省、市进行 1 400 户调查,全国推论精确度在 98%、省市一级在 92% 左右。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家庭经济与生育专项抽样调查,在全国尚属首次,取得的数据资料表明,对于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研究人口与经济的相关关系很有意义。为了方便各界使用,公开出版《中国 1992 年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资料》,召开了国内、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英文文选。笔者作为项目主持人,撰写了“中国 1992 年家庭经济与生育 10 省市抽样调查报告”,并主编《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专著。收入本《文集》第二部分的几篇论文,着重分析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家庭经济基础,即目前中国孩子成本—效益的具体状况。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科学成分,提出并论证了社会附加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给出具体计算方法,可谓对已有理论的一项发展。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孩子成本—效益的研究,还局限在家庭经济领域,局限在家庭经济学范畴。而我们的研究则突破这种局限,加进诸如对独生子女的奖励——增进该子女的效益,征收计划外生育子女费——增加该子女的成本等的社会调节

要素,构成社会附加孩子成本一效益,从而构建成相应的理论。其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理论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利益导向机制,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运用利益导向在解决人口问题中的主导作用。

第五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将人口发展战略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收入本《文集》的为第三部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12篇文章,第二部分“人口与经济”一些文章也包含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一部分以“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为代表,阐发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5个领域的相关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笔者提出: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人类参与的资源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发展;其基本的理论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论,包括融数量、素质、结构于一体的全方位适度。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切发展都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其基本的理论为稀缺资源论,无论可再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是稀缺的,以稀缺为核心建立资源开发、利用和再利用的战略。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给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以生态系统论为轴心,把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纳入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依赖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针对当今发展实际,提出总体经济效益论,即不但要顾及一时、一个方面的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长远、全面的经济效益;社会协调发展论,特别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协调。“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分析了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其余人口与资源、环境、现代化等